

文化價值，制度運作，與國家發展： 台灣經驗的歷史制度與心理文化 的分析與詮釋*

魏 鏞

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前瞻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根據筆者在淡江大學主辦，「東方文化與國際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省台北縣淡水鎮，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四、五日）上發表論文增訂並改寫而成；筆者願在此對行政院國科會對與本論文相關研究計畫之支持表示感謝。此外筆者也要感謝在1999至2000年擔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傑出客座研究員期間與Seymour M. Lipset, Alex Inkeles, 及Ramon Myers就本論文相關觀念的討論，當然本文內容係完全由筆者自身負責的。

文化價值，制度運作，與國家發展： 台灣經驗的歷史制度與心理文化 的分析與詮釋

魏 鏞

1990年代初期隨著蘇聯及共產集團崩潰，世界各國產生了對自由企業與西方式民主之未來發展前景的高度樂觀之估測。然而進入廿一世紀後，隨著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衝突與戰事，中東情勢的持續惡化，因911事件而格外突顯的不同宗教及文化的衝突；加上部份高度發展的自由經濟（如日本）的長期低迷，世界性生態環境惡化及全球溫室效應，上述樂觀的憧憬即使未煙消雲散，也至少大打折扣。

從世界各國在過去廿餘年的經驗看來，顯然單純的自由經濟發展促進政治民主及穩定的模式並不能完全解釋這段期間所有國家的經驗。一國國民的文化價值觀，政治意識型態，精英的領導與努力，國家及政府制度的建立與運作，以及國家領導人的心理需要與群眾的精神需求（psychic need）的互動，都會影響到一國的社會及政治發展的品質與方向。

對以上狀況，筆者有一個基本觀點，就是社會科學單一取向的有關國家發展的理論，無論是有關文化價值，經濟成長，社會發展，及制度影響的分析架構，已不足以解釋廿世紀末期以來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一個新的針對各國、各族群，及宗教團體領導人的心理狀態及其追隨者的精神治療的需求（psychic-therapeutic needs）的互動關係來解釋社會政治發展的過程及結果的模式乃甚有必要。

另外一個有關政治發展與現代化過程分析的共同缺點，即缺乏對各國政府實際上如何建立制度並加運作以達成國家建設目標的第一手敘述，結果往往產生了眾多學者高度抽象的模式及未曾參加實際發展及建設過程者的過度概念化（over conceptualized）的剖析，卻未能對國家發展實際的歷史及制度過程加以掌握及描述。因此如何將實際參與國家建設過程之決策者及執行者之第一手觀察暨經驗納入吾人分析之中，亦為研究現代化問題之要圖。

基於以上多重考量，本文著者乃以社會科學研究者及中華民國臺灣建設過程之實際參與者之雙重身份，對以下與本論文主題有關之各個層面一一加以分析：（一）現代化與東亞發展過程；（二）文化價值與亞洲開發經驗之辯論；（三）現代化之分配性模式—自覺性之發展與力求自主的過程；（四）經濟成長、社會平等、與政治民主—簡明精實模式的嘗試；（五）制度化建設過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經濟建設之回溯與詮釋；（六）心理治療與民粹主義的政治——另一種解釋現代化與政治發展的模式；（七）從理性化建設到非理性化操控—臺灣經驗對世界的啟發及含義。

一、現代化與東亞發展過程

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局勢最主要發展之一，即為亞洲及太平洋地區之興起；而亞太地區之經貿、科技，以至日益增加之國際政治影響力，多年來又以日本為首之東亞區家及地區為核心。在五十六年時間內，非僅日本已成為足與美國及歐洲抗衡的經貿大國，就是中華民國、大韓民國、新加坡、及香港，也成了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佔有相當比重的新興工業國家及地區¹。近十年來，中國大陸一方面採擷了西方市場經濟的作法，另一方面仍維持其社會主義的政治運作，達成了高度的經濟成長及一定程度的政治穩定。中國大陸在未來亞太地區及全球上的角色，也越來越受到各國學者的重視。²

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東亞國家形成足與歐美國家分庭抗禮的經貿及科技力量，是工業革命後的一件大事，因為自從十八世紀中葉後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以來，全世界的國家莫不成為歐美經濟、貿易，及軍事力量膨脹及控制的對象，於此亞洲國家也不例外。然而經過了近兩百年的奮鬥，當世界其他地區仍然處於依賴歐美國家的落後地位之際，上述東亞國家卻能在激烈的世界經貿及科技競爭上脫穎而出，形成一股震撼歐美的新銳勢力，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值得東亞國家的領袖及人民引以為榮。

近十餘年來，東亞國家的發展成就已為舉世所公認，隨之而來的是各國領袖對此地區的發展過程產生莫大興趣。此不僅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地區之發展中國家如此，就是由共產主義邁向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蘇聯及東歐地區亦是如此。於是所謂「日本模式」、「漢江奇蹟」、「台灣經驗」、「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國發展模式」以及「東亞發展模式」乃先後應運而生。³

然而對於以上各種模式的解讀卻各調不同；試圖將以上模式移植至其他地區的努力也不一定獲得立竿見影的功效。屬於純技術性的農業及工業生產的技術移

¹ 參看牧野昇，《全預測：九〇年代的經濟、產業、經營、技術》，鄭凱譯（東京：三菱綜合研究所，一九九〇年）；Robert O'Neil (ed.), *East Asian, The Wes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7); Shibusawa Masahide, *Japan and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Profile of Change*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4); and Donald S. Zagoria, *The Reg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y of East Asia: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No. 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Asia and Soviet Research, 1991)。

² 請參看 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n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³ 見 Lawrence J. Lau (ed.), *Models of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85);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and Oxford: Transaction Books, 1988); James C. Hsiung et. al. (eds.), *The Taiwan Experience: 1950-1980* (New York: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1981); and Ezra E.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aul W. Kuznets, "An East Asian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6, No. 3 (April 1988), pp. 11-43; Bela Balasa, "The Lesson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6, No.3 (April, 1988), pp. 273-290。

轉較易看到績效，可是一旦牽涉到政治及行政改革乃至社會及經濟資源分配的層面，東亞經驗的移植便遭遇到困難。土地改革在台灣獲得成功，但卻未能在菲律賓及拉丁美洲獲得同樣的成果便是一個例子。

由此便產生對所謂「東亞發展模式」的一些新的探討與評估，在檢討過程中所提出的問題包括：「現代化」的含義如何？東亞國家發展經驗的核心內涵為何？那些因素及發展策略促成了東亞國家的「現代化」？這些因素及發展策略能否運用於其他國家而產生同樣或類似的結果？要回答上述問題，首先要對現代化的含義及東亞國家發展過程之意義加以探討。

有關現代化的含義方面，首先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二次大戰後，成為歐美學術界，尤其是美國學術界的研究顯學——「現代化」(modernization)——其實是個意義不甚明確的概念。在初期有關現代化問題的研究中，「現代化」幾乎成為工業化的同義字，因此一個國家工業化的程度便也成為「現代化」的指標。除了工業化以外，接受西方國家文物制度的幅度與深度也常被用來度量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程度。於是「現代化」便成了「西方化」(Westernization)的代名詞。⁴

除了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以工業化及西化作為現代化的衡量標準，西方學者在分析現代化問題上常有的另一個傾向，便是把非西方國家接受或追求工業化以及向西方國家學習，看成是一個自助自發的過程，似乎認定非西方國家的領袖及人民均係自然而然地欣羨西方的物質文明，因而產生效法之心。然而經過深入一層的探討後，我們便會發現，不僅以「工業化」及「西化」當成「現代化」的指標在概念及方法論上值得檢討，就是把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看成是一種自動自發的過程也與這些國家的歷史經驗不相契合。

就以中國及日本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後的現代化努力，實與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兩個戰役中所遭遇的軍事挫折，以及在太平天國之亂中，借助外人的軍事科技打擊太平軍獲得績效因而產生效法之心有密切關係。因而在一八六〇年左右所發動的同治中興或自強運動，從開始就有很強烈的「救亡圖存」及「以夷之道制夷」的色彩。張之洞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反映了這種心態；從同治中興及洋務運動係以學習西方國家的軍事設施及工業發展為重點，便可看出這是清廷為了挽救危亡不得不爾的應變措施，而非自動自發的模仿過程。⁵

⁴ 請參看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Gabriel A.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Max F. Millikan and Donald L. M. Blackmer (eds.), *The Emerging Nations, Their Growth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1); P. T. Bauer and Basil S. Yamey,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and Bert F. Hoselitz (ed.),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0); and Eugene Stanley, *The Fu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4);有關「現代化」含義進一步的討論，請參看 Yung Wei, "Modernization in Taiwan: An Allocative Analysis," *Asian Survey*, 16 (March, 1976)。

⁵ 見 John King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再就日本的「明治維新」而言，其內涵雖然超越了中國自強運動的範疇，而納入了經濟、教育、法制，以至文化思想方面的變革。但是明治維新的基本導因，還是來自西方國家的刺激與威脅，而美國海軍將領培里（Matthew C. Perry）在一八五三年及一八五四兩度率領艦隊進入日本領海並迫使日本簽定通商友好條約，實為促成明治維新的主要動力之一；而「尊王攘夷」使成為追求富強，抵抗歐美的號召。⁶

由此看來，無論中國及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後所進行的現代化的努力，就帶了相當程度的救亡圖存，不得不爾的成份。既然如此，則學習歐美的科技及經貿制度，其目的便不是將自己的國家完全西化，相反地，中日兩國從事現代化建設的目的，乃在於學習歐美的科技，增強本身的國力，以達成有效抵抗西方國家的侵略與控制，維護國家的生存與文化的延續為目的。只有在認識這種動機與心態下，才能瞭解創造「中學西用」及「蘭學和用」的中日兩國政治領袖及學者的苦心。⁷就以近十餘年來中國大陸的發展，也是在維護其本身的政治體系的前提下，借重歐美的經貿發展經驗，其精神基本上繼承了十九世紀中日兩國的現代化努力。⁸

筆者不厭其詳地將現代化的含義，從中日兩國的歷史經驗一一加以剖析，其目的一方面在於澄清現代化及國家發展的含義，另一方面也是導正一些西方學者研究東亞國家的發展過程，常常侷限於一九四五年後發展過程的探討，而忽略了東亞國家的現代化，應溯源於十九世紀中葉及後葉中日等東亞國家從事現代化建設的動機，如此則不易對一九四五年後的東亞國家發展過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文化傳統與東亞國家發展過程的關係： 仍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有關東亞國家的發展經驗，事實上應該分成三個部份來觀察，其一是日本；其二是所謂「亞洲四小龍」，亦即南韓、台灣、香港、與新加坡；其三是中國大陸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採取的政治主導及經濟自由的混合建設模式及其成果。日本早在本世紀初便已經具備了近乎西方國家的軍事及經濟實力，這可從日在一九〇五年發生的日俄戰爭中擊敗了帝俄一事可看出，而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突襲時期的日本，其軍事及應用科技的實力顯然已與西方國家相抗衡，因此日本的現代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5)；金耀基等著，《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69 年）。

⁶ Hugh Borton, *Japan's Modern Century*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5); Marius Jansen, *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and Ryusaku Tsunoda,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Source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⁷ 參看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⁸ 有關中國大陸國家發展的基本考量與未來方向，可參閱張國及林善浪合著，《中國發展問題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

化，不是二次大戰以後的事。⁹

但是亞洲四小龍的情形則不同，它們的現代化程度逐漸趕上歐美，的確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新發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四個國家及地區都曾經是殖民地，其中香港及新加坡是英國的殖民地，南韓及台灣則是日本的殖民地；第二，這四個國家及地區都是受儒家文化影響地區，其中有三個更是華人的聚集地；第三，所有四個地區都十分依賴對外貿易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

至於中國大陸的發展，尤其在沿海各省的經濟發展已贏得學世的注目。學者們儘管對中國大陸參加WTO後的可能發展有不同的評價，但是基本上對北京當局透過積極的經濟開放和有限度的政治及行政改革，達成了高度經濟成長和政治穩定，予以正面評價。¹⁰

對於東亞國家在過去四十餘年發展的成果以及東亞地區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日益增加的比重，各項研究及報告均有詳細的敘述，此處不必贅言。¹¹值得探討的是：為什麼二次大戰後現代化努力，在東亞地區看到具體的成果，而在其他地區則遭到挫折與失敗？是東亞地區的文化價值較適合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或是東亞各國政府採取了適當的政策措施及創立了促進工商發展的制度所致？或是有其他的內在及外在因素，如外在的威脅，及人口擁擠，資源缺乏所導致的急迫感和危機感所促成？這些都值得我們根據各國實際經驗，加以深入客觀的分析。

先就文化傳統而言，部份研究現代化的學者，認為現代化需要一種追求成功及進步的一種心理狀態及價值觀，否則即不易起步¹²。就日本、四小龍及中國大陸而言，均係屬於所謂「儒家文化地區（Sinic or Sinitic Cultural Sphere）」¹³，如此則儒學文化之價值觀及社會制度是否適於工商業發展，便成為學者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

早期西方學者多認為儒家文化不利於工商業之發展，其中尤以德國學者威伯（Max Weber）為代表。威伯在其鉅作《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精神》一書及其他相關著作中，認為中國及印度之文化與宗教傳統，不適合於現代化之發展

⁹ 請參看 William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1868-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¹⁰ 有關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績效及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關係，請參看 Chu-yuan Cheng (鄭竹園), "The Economic Reform in Mainland China: Program, Consequences and Prospect," 見《國際社會變遷下的中國大陸政經改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國立台灣大學合辦，民國 91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Yu-shan Wu (吳玉山),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under Authoritarian Regime: China in the 1990's," 出處同上篇論文；另有關台海兩岸經濟發展的宏觀剖析，請參看 Wei Wou, *Capitalism A Chinese Version*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2)及魏萼，《中國國富論》（台北：時報文化，民國 89 年）。

¹¹ 見 Herman Kahn and Thomas Pepper, *The Japanese Challenge* (New York: The Hudson Institute, 1978)。

¹² 關於此類觀點，請參看 David C. Mc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1)。

¹³ 參看 Peter L. Berger,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in Berger and Hsiao *op. cit.*, pp. 3-11; Herman Kahn et. al.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jection from 1978 to the Year 2000*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8), pp. 113-117。

¹⁴。威伯這種看法引起了相當大之迴響。譬如華裔學者何炳棣便認為中國揚州鹽商因為傳統中國家庭倫理觀念而必須將其財產與族人分享，因而妨礙到資本之累積，從而影響到資本主義在中國之發展。¹⁵

但是二次大戰之後。東亞儒家文化地區現代化建設之成功，卻大幅修正了威伯等人認為儒家文化有礙現代化的理論。進而認為儒家倫理價值觀——尤其是「新儒學」(Neo-Confucianism)——有助於持續工商業發展及政治穩定。從赫滿堪恩 (Hermen Kahn)、傅高義 (Ezra Vogel) 及彼得柏格 (Peter L. Berger) 等學者的論著中，¹⁶可以綜合出一些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重視自我修養及訓練，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尊重權威及講求秩序，提倡節約及克制，以及追求社會及政治穩定的各項價值觀，加上穩定的家庭結構，均有助於經濟發展。

以上西方學者肯定儒家文化有助於東亞國家現代化的研究結論，對於東亞國家的領袖及人民，因有莫大的鼓舞作用，但是東亞國家人士在受寵若驚之餘，似應要提出三個問題：第一、設若儒家文化果真有助於國家現代化，為何西方學者要等到東亞國家工商業發展成功後才作出這種結論，這是否是一種事後有先見之明而落在事實之後的分析 (Post-facto analysis)？第二、如果儒家文化價值體系是非西方國家現代化成功的一個必要或重要前提的話，那麼不屬於儒家文化範疇內的其他非西方國家如何能夠邁向現代化呢？第三、回教世界在目前顯然要算是經濟發展較落後的地區，可是在中世紀回教國家曾經享有高度科技文明，甚至領先同時期的歐洲，據此則僅以文化因素，顯然不能完全解釋一國現代化之成敗。

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我們必須在文化因素之外找答案，這就進入了東亞國家現代化過程研究中的「制度化途徑」(Institutional approach) 的範圍。主張因制度化因素來解釋東亞國家現代化過程的學者認為東亞國家在二次大戰追求工商業發展獲得成功之主要原因，除了文化因素以外，最重要是這些國家的領導階層，有極旺盛之企圖心，並且採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所致。這種分析在經濟範疇中尤為明顯。¹⁷

在西方學者分析東亞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獲得成功所提及的因素中，最常看到的包括：政府精英的有效主導，採用一定程度規劃性的自由經濟政策作為發展的指標；培養並善用豐富的人力資源；採取漸進的經濟發展政策，先發展農業，再

¹⁴ Max Weber, *Religion of China* (Glencoe, N.Y.: Free Press, 1951)。

¹⁵ 參看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及作者其他相關著作。

¹⁶ Kahn, *op. cit.*, Vogel, *op. cit.*, Berger 及 Hsiao, *op. cit.*。有關儒家思想在中國及日本之不同影響，請參看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¹⁷ 請參看 Harmon Zeigler, *Pluralism, Corporatism and Confucianism: Political Associations and Conflict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Taiw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Char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Gustav Papasek, "The New Asian Capitalism: An Economic Portrait," in Berger and Hsiao, *op. cit.*, pp. 27-98; and Walter Arnold, "Bureaucratic Politics, State Capacity, and Taiwan's Automobile Industry Policy," *Modern China*, Vol. 15, No. 2 (April 1989), pp. 178-214。

利用農業人口收入的增加支持輕工業的發展；採取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有效利用外援支持財經政策之達成；用財稅政策及其他相關措施同時達成經濟成長及收入之平均分配；著重教育發展作為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基礎；維持高度的行政效率及政治社會秩序以提供經濟持續發展之環境。¹⁸

一般而言，經濟學者對於促進東亞國家現代化之制度性因素之分析，與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政治學家及公共政策專家，尤其是非西方國家的學者，所獲致的結論共相契合。基本上他們不再相信「現代化」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現象，相反地，他們認為國家在一國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將國家及政府的作為作為一個主要的獨立變數，用來檢視其與相依變數——國家現代化——的關係，便成為公共政策學者及國家角色研究者的一項分析的主題。¹⁹

三、民主政治、社會平等，與經濟發展： 現代化定義的探討及經驗性模式的嘗試

從以上有關文化及東亞發展經驗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國家所認定的現代化多半有相當成分的自我肯定，甚至自我中心的傾向。至於認為儒家文化是促進東亞國家從事現代化國家建設的主要因素，也仍有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之點，因此要有效探索東亞國家發展經驗，必須要同時從概念的澄清及實際發展及建設經驗的驗證著手不可。

在基本觀念的澄清方面，筆者在多年前的研究中便發現，西方學者所提出的「現代化」的概念，其實是一個十分主觀的甚至是意識型態性的名詞。²⁰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西化」便是「民主化」的偏見之外，另一個西方學者常犯的毛病便是強調政治民主化在國家建設上的重要性。把政治民主作為導致經濟發展的獨立變數，其實事實的狀況並非如此。

根據筆者綜合眾多研究現代化問題中外學者的研究，大家提到次數最多的變數有三，即「經濟成長」、「社會平等」、與「政治民主」。由於處理這三項變數之間關係的不同，筆者把各種有關現代化及政治發展的現論分為三類：

（一）混沌的現代化理論：此類學者把經濟成長、社會平等、及政治民主混在一起討論，並不深究其間的因果關係，基本上認定民主政治會與社會平等及經濟成長同步發展，不分先後軒輊。（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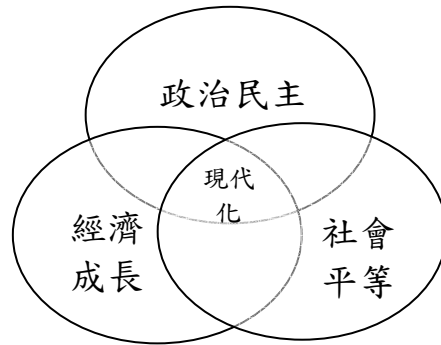
¹⁸ 見 Richard A. Higgatt,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London: Croom Helm, 1988)。

¹⁹ 參看 Yung Wei, "Democr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blems,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22, No. 3 (March 1991), pp. 29-48。

²⁰ 請參看 Yung Wei, "Modernization in Taiwan: An Allocative Analysis," *op. cit.*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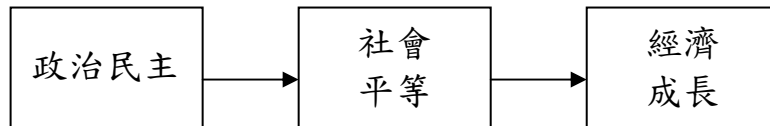
政治民主，社會平等，與經濟成長：混沌的現代化理論示意圖



(二) 自由主義的現代化理論：把民主政治當作一個目標或獨立變數，認為民主政治會導致社會平等，最後導致經濟發展。但是不少經濟及政治學者已經發現，民主政治不一定有利經濟發展²¹，相反地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政治權力與運作的集中，反而是較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策略。臺灣、南韓、新加坡的經驗，似乎多少印證了這一點。(見圖二)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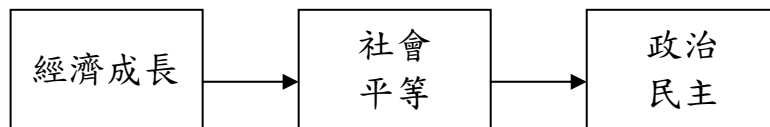
政治民主，社會平等，與經濟成長：自由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示意圖



(三) 保守主義的現代化理論：這派學者把經濟發展或成長作為獨立變數，民主政治作為相依變數，認為經濟成長會導致社會平等，進而導致民主政治的來臨。Lipset、Inkeles及Inglehard等多位學者均持這種看法；多數國家的發展經濟似乎也支持這項理論。²² (見圖三)

圖三

政治民主，社會平等，與經濟成長：保守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示意圖



²¹ 請參閱 Robert J. Barro, "Is Democracy Good for Growth?" *Hoover Digest* (1996, No. 2), pp. 14-18。

²² 見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Alex Inkeles and David Smith, *Becoming 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筆者對於以上的各種理論，提出一項主要保留性的意見，那就是對於上述各項變數，多數學者只注意到他們總體價值（aggregate value）的增加或減少的問題，而未注意到分配的問題。因此我在多年前提出了一個兼顧「能量（Capability）」與「分配（Allocation）」的現代化分類的模型如下：²³

圖四、現代化：一個「能量」與「分配」關係的示意圖

社會之能量	分配過程	
	更平等	更不平等
增加	I	II
降低	III	IV

由圖四可以看出四種關係，第I類型為社會能量（經濟、社會、政治）提高而各種價值分配更平等的社會；第II類型為能量提昇但分配更不平等之社會；第III類型為能量下降但分配更平等之社會；而第IV類則為能量下降且分配更不平等之社會。

根據上述圖形，由第IV型邁向第I型自然為最典型之現代化過程；其次為由第II、III型到第I型；再次乃由第IV型到第II、II型。不過由第II型到第III型或相反之演變是否為現代化，便有許多爭議，而將以判斷者之意識型態而決定。

把現代化之類型加以分析後，以下便可將經濟成長，社會平等，與政治民主三者之間的關係加以剖析。圖五是一組有關三者之間關係示意圖，其中「圖五之一」顯示一定程度之社會平等將有助於經濟成長，但過度則不利經濟成長。「圖五之二」顯示一定程度之政治民主之將有利經濟成長，但過度則反是。「圖五之三」顯示社會平等與政治民主之成正相關之關係。將圖五所含各分圖統合在一起便得到圖六有關經濟發展、社會平等、與政治民主之三者關係之立體示意圖。此圖所展示之關係應可用數量化之實證資料加以驗證。

以下圖五及圖六所含之模式雖對上述三組變數之關係作了相關性（correlational）之展示。但是並沒有掌握第四項變數，那就是時間。而從臺灣地區建設之經驗觀察，在不同之時期中，不同之因素分別形成獨立變數或相依變數。譬如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初，在先總統蔣中正先生主持，從事各項黨政改革，此時政治發展實為獨立變數；其後推動各相經濟建設，經濟發展乃成為獨立變數；再其後因經濟發展導致中產階級在台灣之興起，影響到政治上的新需要，此時社會因數乃成為社會變數；及至蔣經國總統去世，李登輝，陳水扁相繼擔任總

²³ 請參看 Yung Wei,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aiwan: An Allocative Analysis," *Asian Survey*, Vol. XVI, No. 3 (March, 1976), pp. 249-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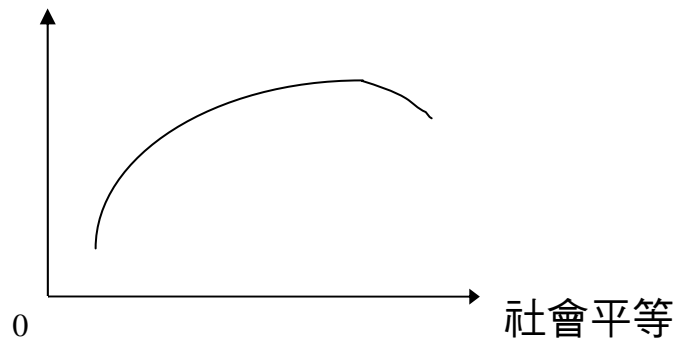
統後，政治發展乃再度成爲獨立變數，影響社會發展及經濟成長。這種因時期之不同而形成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因素間不同的關係，筆者試以圖七的模式來說明。

圖五

經濟成長、社會平等、與政治民主之關係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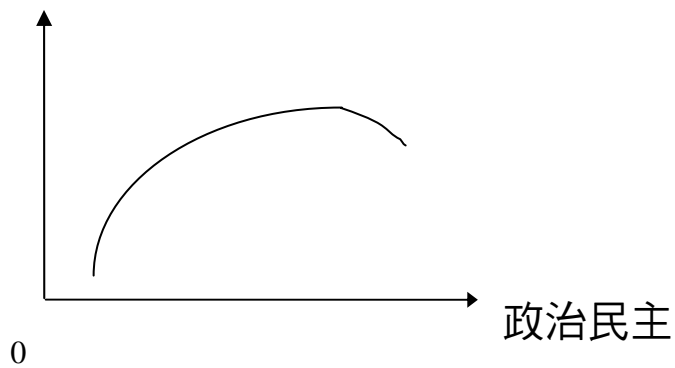
經濟成長

圖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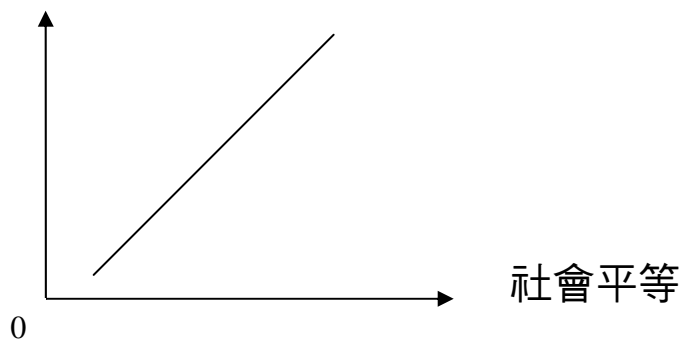
經濟成長

圖五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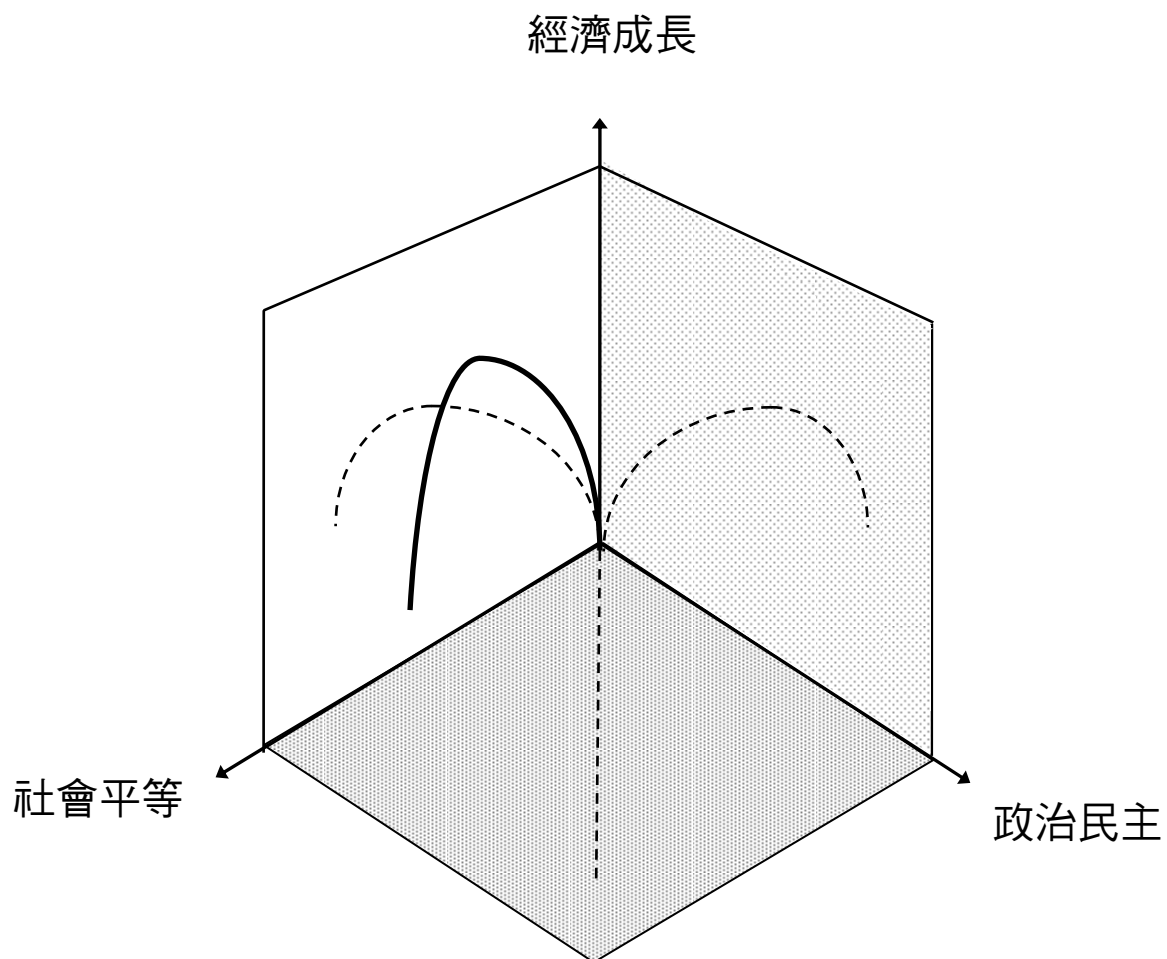
政治民主

圖五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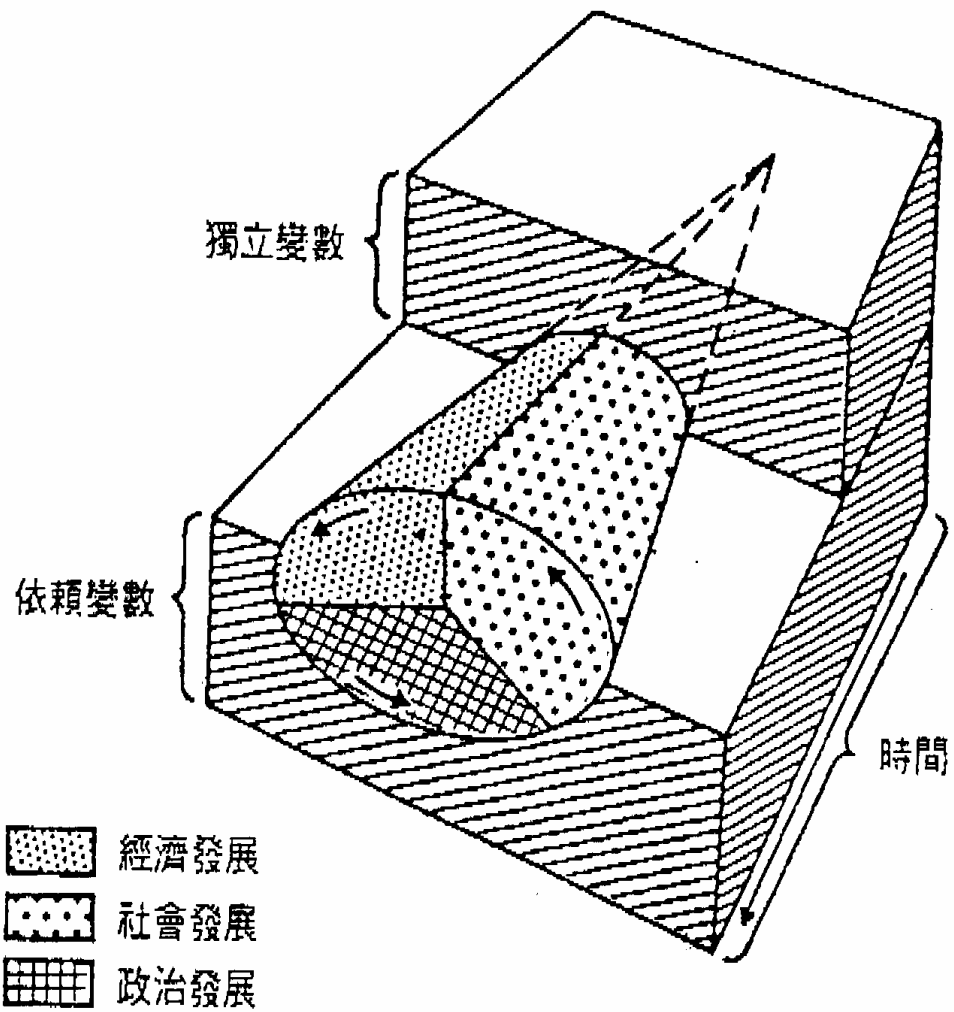


圖六

政治民主、社會平等、與經濟成長：
三者關係之立體示意圖*



圖七 社會、經濟、與政治發展：一個動態模式示意圖



四、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發展過程－歷史的回溯與制度性的探討

以上筆者所建構的各種現代化的模式，雖然有澄清現代化觀念的作用，同時也可以收集經濟性的資料加以驗證²⁴，但是有鑒於一國國家建設層面之廣闊及過程之繁複，確非簡單兩三變數之模式得以充份說明，因此筆者決定採取宏觀的歷史回溯及制度性探討，亦即晚近西方學者所提倡之「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方式加以闡釋。²⁵

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如何透過各項政策措施，使得台灣這個日本殖民者控制了五十年的中國領土，重新成爲中國文化及政治體系的一環，並且形成世界上主要貿易國家之一的過程值得加以簡要的回顧。

中華民國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遷台。經過五十三年時間，中華民國政府將台灣地區從一個以農業及輕工業爲主的社會，轉變成一個以出口貿易爲主，以資訊、電子及機器等製造業及服務業爲重心的經濟結構；同時透過經濟的持續成長，人民生活水準與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民壽命顯著延長，政治及社會日趨平等開放，中產階級業已形成，且成爲社會中堅份子，文化藝術活動也逐漸趨向多樣化與多元化；凡此均是每一位曾參與此項建設過程的人士所可引以爲自豪的成就。儘管近年來政治方面朝野衝突加劇，經濟成長變緩，但台灣經濟及社會仍持續展現活力。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地區經由何種過程以獲得如許成就？是世界各國關心現代化理論學者們所亟欲探討和瞭解的問題。過去，學者們對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與成就，常著重於經濟層面，而對於現代化建設成功的解釋，亦常訴諸經濟因素。他們認爲：只要一個國家能夠透過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則其他問題多半可迎刃而解。但正如上節討論東亞國家的發展模式時已經證明這種看法，顯然過於簡單與狹隘；不僅社會文化模式會直接促進或阻擋經濟發展，國家行政機關和公共政策之規劃及執行對社會及經濟發展，也具有極顯著的影響。

在民國六十五年至七十七年間，本文作者擔任了中華民國政府負責政策規劃及評估機關——行政院研考會——十二年的首長，親身參與了許多政府政策的規劃及推動工作，因此乃可從實際「參與性觀察」（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的角度作一些回顧檢視及分析。²⁶在此筆者首先要提出的觀察是：從台灣地區現代化

²⁴ 請參看 Yung Wei, *Science, Elite, and Modernization*,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80; second ed., 1986); Yung Wei, "Planning for Growth, Equality, and Democracy: The Roc'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Policy Planning*, (Taipei: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1989); Yung Wei,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70s: Striving for a Future of Growth, Equity, and Securit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Journal*, (Fall, 1977); Yung Wei,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aiwan: An Allocative Analysis," op. cit.; Yung Wei, "Taiwan: A Modernizing Chinese Society," in Paul K. T. Sih (ed.), *Taiwan in Modern Times*, (Jamaica, N.Y.: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²⁵ 請參看徐斯勤，〈新制度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理論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政治學報》，32（民國 90 年 12 月），95 至 168 頁。

²⁶ 有關筆者在行政院服務期間參與政策規劃及評估之敘述，請參看魏鏞，〈在學術，政策，與政治之間：從事研考工作十二年的回顧與展望〉《近代中國雙月刊》，131 期（民國 88 年 6

的歷程觀察，台灣過去建設的成就不僅與中華民國政府的有計劃的施政作為有密切關係，而且隨著經濟快速成長所引起的政治、社會、文化、倫理道德以及兩岸關係、國際環境等各種問題，未來政府也必須透過積極性、前瞻性的政策規劃與行政作為，才能有效加以克服。

以筆者的觀察，自從一九四五年自日本手中收復台灣以來，台灣地區五十多年的現代化建設及發展的歷程²⁷，大致可區分成以下八個階段：

（一）光復與重整時期（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

台灣光復初期，由於戰爭的破壞，一切百廢待舉；隨著四十八萬日本人遣返日本，形成了行政管理、技術、及教育方面人才的缺乏，惟中華民國政府立即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及公民教育，推行國語運動，凡此均對促進共識增強團結甚有助力。民國三十九年，政府播遷來台，此時軍隊亟待整頓與補給，大量大陸來台民眾亦待安頓，物價上漲，幣值不穩定，情況至為艱苦。三十九年三月先總統 蔣公復行視事，加以韓戰爆發，美援恢復後，情況逐漸地改善；在此期間，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先生積極主持規劃黨政改造措施，如中國國民黨之「中央政造委員會」及「革命實踐研究院」的設立，對於推動政治與行政革新，加強人才的培養與融合，以及促進各項經濟社會建設的推展，均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規劃建設與推動發展時期（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七年）

民國三十九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地區開始施行地方自治，復於四十年成立台灣省臨時議會；此外，推行一系列全面性的土地改革措施，包括三七五減租，耕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這些措施不僅改善農村經濟，促進了工業成長，同時也提高了農民的社會及政治地位，為後來的民主政治奠下基礎。此外並透過教育發展計畫，培養大量人才，對於茲後政治發展與現代化建設，影響至為深遠。在經濟發展方面，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實施第一期「四年經濟計畫」，本「農業支持工業，工業發展農業」之政策，同時推動工業與農業發展，於是乃引導台灣邁入持續建設與發展階段。

（三）持續成長與轉化時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

在此期間，議會政治日益發展，執政的國民黨運用其力量改造農會，建立地方民眾服務據點，擴大農村及地方基礎。在社會變遷方面，省籍與大陸來台同胞的通婚情形，日益普遍，導致省籍的隔閡日趨下降。民國四十七年，蔣總統設立「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進行廣泛的行政改革規劃工作，對於促進行政的革新進步，支援經濟建設的發展，助益甚鉅。在經濟方面，農業持續成長，工業生產

月 25 日)；魏鏞，《行政工作報告》(台北：行政院研考會，民國 70 年 3 月)；《行政院六年施政重點及績效報告》(民國六十七年六月至七十三年五月)(台北：行政院研考會編印，民國 73 年 5 月)；魏鏞，「結合民意，開創新機：邁向前瞻性政策規劃」，以從政黨員身份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上之報告(台北：行政院研考會，民國 75 年 6 月 18 日)；魏鏞，「向穩定、和諧、革新的道路邁進：從六次民意調查結果看政治發展趨勢」(台北：行政院研考會，民國 75 年)。

²⁷ 參看 Yung Wei, "Democr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blems,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op. cit.*, pp. 29-48。

所占比率亦逐年提高，而年經濟成長率達百分之十。

（四）邁向經濟獨立與加速發展時期（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

民國五十四年美援停止，但對台灣經濟並未產生明顯不利影響，在此一階段，台灣地區獲得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每年經濟成長率均在百分之十以上，其原因固然由於世界經濟景氣蓬勃所致；然而台灣地區的政治安定、教育普及、人才匯集，以及科技進步，亦屬重要因素。

五十五年行政院組設「行政改革研究會」，進一步推動行政的革新，並於五十八年成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司政策之分析，規劃及管制考核工作。

五十七年施行九年國民教育，五十八年辦理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強化民意機關的功能，促進政治之參與，提昇民主憲政的層次。民國六十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從此遭遇政治及外交發展上新的挑戰。

（五）克服衝擊穩定成長時期（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八年）

在此期間，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世界經濟景氣衰退。迨六十四年蔣總統中正逝世，越南陷共，台灣地區同時面臨政治及經濟各項衝擊，惟中華民國政府之領導階層均能以堅定沈著之態度予以因應；在經濟上積極推動十項建設計畫；在政治上繼續推行民主憲政，頒行十項行政革新措施，此外並推動為民服務工作，爭取民眾向心，終能克服各項挑戰，維持經濟之持續成長與社會的安定發展。

（六）突破橫逆與轉型蛻變時期（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

六十七年底，美國宣布與中共建交，接踵而來第二次石油危機，對台灣地區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再次造成嚴重的衝擊。有效克服這些衝擊，執政黨與政府部門先後制定「復興基地重要建設方針」、「貫徹復興基地民生主義社會經濟建設案」，及「台灣地區經濟建設十年計畫」等一系列中長程建設計畫，並繼十項建設後，賡續推動十二項及十四項重大經建計畫，使得中華民國在重重內外壓力下，仍能透過各項重大施政計畫之實施維持穩定與成長。

然而台灣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發展雖已到達轉型蛻化的階段，中華民國政府有鑒於此，乃於七十四年設立為期六個月的「經濟革新委員會」，為未來經濟結構的轉變與發展研擬可行方案，在政治方面，執政黨在七十五年三月舉行十二屆三中全會後，即成立十二人小組，研討六大政治革新議題，包括國家安全體制的建立（解除戒嚴），修訂「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開放政治性團體）、修訂「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推動地方自治法制化，促進社會風氣之改進，以及從事現階段黨政中心任務之檢討等；此外行政院亦於同年六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行政會議」，研討行政再進一步全面革新的各項措施。凡此，均將使中華民國的政治及行政發展邁向嶄新的階段。

（七）因應政治變遷、加速改革階段（一九八八年至二〇〇〇年）

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蔣總統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先生繼蔣經國先生成

為中華民國總統；不久之後，李登輝先生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中被推舉為代理主席，後來在第十三屆二中全會中又真除為黨主席，此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就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進入所謂的「後蔣經國時代」。

李登輝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此時期的作為，可分為兩個時期；前六年李總統基本上繼續了蔣經國總統的政策。在國內政治發展方面，李總統逐步消弭或至少壓制了國民黨黨內的抵拒，完成了總統的選舉，李登輝先生和李元簇先生分別當選為中華民國的總統及副總統，在外交方面採取務實外交，和許多小型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在大陸方面制訂「國家統一綱領」，使台灣和未來大陸發展有了中長期的展望；此外，並積極規劃憲政改革，基本上是以不更動原來的憲政條文，而以增修條文的方式來適應未來的狀況。在國會改革方面，透過大法官二六六一號的解釋後，責成資深中央級民意代表在本年年底退職，同時並規劃選出新的、修憲國民大會代表。²⁸然而在李總統主政的後六年中，他認為政局已在他有效控制之下，因而採取了一系列的台灣地區政治、兩岸關係，及國際關係上的激進措施，包括廢除台灣省，剝奪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的同意權，實施總統直選，宣佈台海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並在國際推動加入聯合國，進行南向政策，推動元首至無邦交國家訪問。這些政策導致國民黨內強烈抵拒，直接間接導致國民黨的分裂。

（八）政黨輪替、經濟衰退，與兩岸僵持時期（二〇〇〇年迄今）

民國八十九年（公元二〇〇〇年）五月的總統選舉，國民黨由於分裂，產生了代表親民黨的宋楚瑜與代表國民黨以連戰競爭的狀況；結果導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百分之卅九的選票當選少數選民支持的總統，開始了政黨輪替的新階段。接著李登輝由於受了黨內同志懷疑支持他黨總統候選人及脫離國民黨的一貫路線而被撤銷黨籍。親民黨在民國九十年底的立委選舉上得利，獲得四十五席，成為立法院第三大政黨。陳水扁政府宣佈停建核四。但在在野黨壓力下加以恢復。經濟成長下降，失業率上升，外交及國防因有美國強力支持顯得局面尚可，但台海兩岸關係因大陸對陳水扁總統之不信任及台北不肯重申「一個中國」政策和不接受「九二共識」而陷入僵局。此外由於以李登輝前總統為精神領袖的台灣團結聯盟的興起，提昇了台灣地區本土主義的氣氛，間接導致族群關係的繃緊；朝野政黨在重大政策上的強烈對峙，也不利於台灣的政經發展。

五、台灣地區發展過程的歷史制度性詮釋

對於台灣地區現代化過程含義之詮釋，本文作者的基本看法是要用兩種不同類型的模式來解析。有關台灣透過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逐步邁向政治開放的過程，可以用價值分配及制度化建設的模型來解析。但對台灣地區發展過程中，產

²⁸ 請參看 Yung Wei,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nterplay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Variabl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U.S.A. August 28- Sept. 2, 1991)。

生了激烈內部政治衝突，尤其對李登輝主持政府後六年的狀況，則要用心理治療（Psychic-therapy）及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的模式來解析及預測。

在提出上述兩種模式之前，筆者願先就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地區推動現代化建設獲得成功的因素，先作一整體性的評價：

（一）重視文化傳統的發揚及維護

不僅在遷台初期，全面推動國語運動，促進台灣地區民眾語言之統一，同時並推行中國歷史、地理、民族精神教育，及公民教育，以培養國家觀念及現代國民之理念。²⁹

（二）根據建國理想，規劃施政藍圖

依據孫中山先生之建國理想³⁰，發展出一系列開放性之國家發展計畫，包括土地改革、經濟發展、教育發展、地方自治和議會政治等方面³¹（註二十四），這一連串之發展計畫可隨時因客觀環境之變化而加以調整，以反映客觀狀況，有助於順利達成目標。³²

（三）重視人才培養，作為建設主力

蔣中正先生在世時一向重視人才培養工作，來台更備加留意，除了經由教育制度，培養大批人才外，並經由各項短期訓練，培訓政治及行政人才。此外並積極延攬海外華裔人才返國，加入建設行列。經由上述各方面的努力，使台灣地區之大專人口，從一九五二年之八萬六千人增加為一九八九年之一百九十一萬人。此種高度教育人口之增加，大有助於各項建設計畫之推動。³³

（四）推動教育發展，支援國家建設

²⁹ 參看 Yung Wei, "Taiwan: A Modernizing Chinese Society," in Paul S. Sih (ed.), *Taiwan in Modern Time* (Jamaica, N.Y.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³⁰ 見 Yung Wei, "Sun Yat-sen and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in Paul Sih (ed.), *Sun Yat-sen and China* (Jamaica, N.Y.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³¹ 請參看李國鼎《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經驗》（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七年）；李登輝《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台北：作者自印，民國七十二年）；Chi-ming Hu,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81: Public Polic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Growth with Equity," in Hungdah Chiu and Shao-chuan Leng (eds.), *China: Seventy Years after the 1911 Hsin-Hai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84), pp. 215-257; David Wen-Wei Che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Sun Yat-sen Model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ssues and Studies* (May 1989); and 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³² 有關中華民國政府之政策作為請參看 Yung Wei, "Planning for Growth, Equality, and Securi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delivered at the 43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nolulu, Hawaii, U.S.A., March 21-25, 1982); and Yung Wei, "Policy Pla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8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California, U.S.A., April 13-16, 1986); and Yung Wei, "Policy Plann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a Free and Secure Society in the 1980s" (Report presented at the Monthly Meeting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Taipei, Taiwan, R.O.C., February 1987)。

³³ 請參看魏鏞，「人才引用與政治發展：中華民國邁向已開發國家之經驗與展望」（台北：台大法學院政治系，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

教育發展為推動台灣地區各項建設之關鍵性因素。台灣地區在過去四十六年間，教育獲得長程進展，國民受教育機會日益增進。至公元一九八九年，國民小學之就學率已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高中升大學之比率亦已達百分之四十四點四。在台灣地區之大專院校之數目亦已從一九五二年之八所增加到一九八九年之一百一十六所。³⁴凡此均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及政治參與甚有助益。

（五）注重收入分配，促進平衡發展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推出現代建設之主要目標，不僅在達成經濟之高度成長，也要維持收入之平均分配。為達成此項目標，除採取適當財稅政策外，並採低學費政策，低差距公務人員待遇政策，並不斷擴大社會保險之範圍。以上各項政策實施結果，使得台灣地區民眾所得差距日趨縮小。近年來雖略有擴增但最高百分之廿家庭收入除以最低百分之二十二比例，仍維持在五倍左右，為世界上收入最平均國家之一³⁵。由於經濟持續成長及收入平均分配，台灣地區已形成一強有力之中產階級³⁶，成為維護政治及社會安定之支柱。

（六）採漸進性發展，逐步邁向目標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所推動之各項建設，無論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發展，均強調漸進性發展之原則，以避免推動過激而可能產生之不穩定狀況。

（七）著重制度性發展，避免過速發展引起社會及政治失調

不少非西方國家在推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操之過急，結果各項制度之建立趕不上經濟、社會、及政治發展之速度，結果往往導致各項失調現象。中華民國政府有鑒及此，乃在建設過程中，特別著重於法律之制定、機構之建立及調整，及各項規劃及評估程序之釐定，其目的在於透過制度之建立來吸收現代化及發展過程所產生之各項衝擊，以確保平穩而持續之發展。

（八）政治、經濟、社會建設之交替及階段之發展

西方學者分析國家建設及發展過程時，往往不知不覺採取一種直線型前進性的分析。但是以筆者研究台灣地區現代化過程所獲體認發現，現代化過程有其階段，而不同階段中各項影響現代化過程變數間之關係亦各有所不同。

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在前總統李登輝之政期間，尤其是後六年期間，上述這些導致臺灣地區持續發展的多種策略均作相當大的修正，其中尤以對憲政體制作重大而激進的修改，其結果引發了激烈的政治衝突。目前臺灣政治陷入僵局，經濟邁入停滯，兩岸持續對立，與李登輝的政治更張，多少有一些關係。

³⁴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0* (Taip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O.C., 1991), p. 278。

³⁵ 請參看 John C. H. Fei, Gustav Ranis, and Shirley W.Y. Kuo, *Growth with Equity, The Taiwan Case*,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³⁶ 請參看魏鏞，「我國中產階級的興起及其意義—五次民意調查所得發現的分析（上）、（中）、（下）」，《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廿三、廿四、廿五日），第二版。

六、心理治療政治與民粹威權統治： 台灣地區發展過程的另類模式與詮釋

同時用經驗性的理論模式及歷史制度主義的理念加以分析後，發覺這些分析模型及方式，用諸於一九九〇年以前之台灣發展過程較為貼切，但用來剖析李登輝總統主政後之台灣地區之發展實況，則有相當之限制性，主要原因乃在台灣地區目前所面臨的客觀政經及社會情勢，實有多種未能用上述模式有效解析及預測之處。因此筆者乃根據多年來研究政治人格及政治化所獲的心得，進一步提出另一個模式，即「心理治療的政治（psychic-therapeutic politics）」的模式，來補充已提出之制度性分析之不足。

早在1970年代，筆者即提出了有關中國人政治性格及其行為模式的相關分析，並主張對中國人之文化價值及政治性格加以深入研究以為分析及預測中國文化地區之政治發展之基礎，³⁷其時正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事隔近卅年，台灣地區之政治發展，尤其在李登輝主政後期之作爲，使不少中外社會科學家產生與文化大革命期間之聯想。筆者由是而產生運用政治文化研究之相關概念來建立一個台灣地區發展現象的解釋與預測模式的想法。結果便是筆者於1998年在美國政治學會（APSA）年會上所提出的「台灣地區的心理治療政治：一個心理文化的解析模式」。³⁸

筆者在運用政治文化來分析台灣政治時發現，台灣政治由一黨主導邁向多黨競爭的現象，近年來雖已成國內外不少政治學者研究的重點，但基本上均多半係把各種不同由西方學者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套用在台灣發展過程的分析之上。包括人才引用、政黨競爭、國家角色、依賴理論、官僚威權主義、新制度主義，理性選擇、「第三波」，及後現代主義等各種概念及模式，都曾被用在台灣政治的分析上。³⁹

³⁷ 見 Yung Wei,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urrent Studie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8, No. 1 (February, 1976), pp. 114-140.

³⁸ Yung Wei, "The Waning of 'Therapeutic'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Analysis of Populist-Authoritarianism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998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U.S.A., September 3-6, 1998.

³⁹ 請參看 See for example, Yung Wei, "Democratization, Unification, and Elite Conflict," in Zhi-lin Lin and Thomas W. Robinson (eds.), *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Press, 1994), pp. 213-240; Y. Wei, "Democr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blems,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op. cit.*; Y. Wei, "Elite Conflict in China: A Comparative Not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Fall, 1974); Edwin A. Win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79 (September, 1984), pp. 481-499; Andrew Nathan and Yangsun Chou,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in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risis, 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9-152; Harmon Zeigler, *Pluralism, Corporatism, and Confucianism Political Association and Conflict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Taiwa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 Press, 1988); 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1989); Linda Chao and Ramon H. Myers, "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 *Asian Survey*, 34 (1994), pp. 213-30; T. J.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 (1989), pp. 471-499; L. H. M. Ling and Chih-yu Shih, "Confucianism with a Liberal

但是在眾多台灣研究中，有兩件事付諸闕如；其一是針對台灣各種現象，發展出兼具現實的解釋性及未來發展的預測性的理論模型。這種情況與不少台灣學者習於把西方學者所發展出來的模式硬套在台灣的政治現實之上有相當關係；其二是中外學者都感受台灣目前正在遭到外在環境的高度壓力和威脅，因此，不少外國學者把台灣民主政治加以正面的評價，其原因多少有一點認為這將會有助於台灣的國際形象，從而有助於台灣安全。⁴⁰但其結果都導致台灣政治品質的真相難得凸顯，甚至還間接影響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決策品質。

筆者有鑒及此，乃決定以另一種角度——心理文化的分析——來剖視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並進而發展出解析的模式，希望這樣做能有助於了解台灣地區政治現象的真相。在分析過程中，著國家領袖的心理狀況與人民情緒的互動關係，從而針對「治療性的政治」(therapeutic politics)及「民粹威權主義」的興起⁴¹，暨宣示性政策(policies of advocacy)的產生，一一加以剖析。

本文前面已經指出：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後期，事實上已大幅更改了國民政府的立場及發展策略。尤有進者，儘管台灣地區的民主化，係在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任內就已經開始，不少中外學者都傾向把台灣地區的民主化，視為從李登輝先生就任總統後才開始。對於李總統所推動的各項政府作為及其效果，中外學者間看法有很大的出入。肯定李總統的人士認為他是真正能代表台灣本地人的領袖，他是一位能堅定地抵拒來自中國大陸的壓力、並不斷追求台灣的國際法人地位的總統。尤其重要的是，李總統被支持他的人士認為李總統最了解台灣人的內心世界，所以李登輝先生才最適合領導台灣同胞，共同為台灣的尊嚴及自主而奮鬥。

批評李登輝先生的人士，則指出李總統背棄了憲法及國家統一目標；他所從事的外交突破的努力，也常被認為是過份冒進，而且不利兩岸關係。就連李總統

Face: the Meaning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Postcolonial Taiwa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0, No. 1 (Winter, 1998), pp. 55-82; Chien-kuo Pang,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aiwan Case*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2); Janshieh Joseph Wei, "Institutional Aspect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 Taiwan Experience,"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4, No. 1 (Jan., 1998), pp. 100-128; Yun-han Chu,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1992); Emerson M. S. Niou and Peter C. Ordeshook, "Notes on Co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Presidential versus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December, 1993), pp. 203-256; Thomas B. Gold,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aiwan," Ph.D. Thes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Julian J. Kuo, *The DPP's Ordeal of Transformation*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er, 1998); John Higley, Tong-yi Huang, and Tse-min Lin, "Elite Settlem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2 (April, 1998), pp. 148-163; Alice H. Amsden,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statism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t Theory," *Modern China* 5, No. 3 (July, 1979), pp. 341-79; and Cal Clark, "The Taiwan Exception: Implication for Contending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1, No. 3 (September, 1987), pp. 287-356; also see Guillermo O'Donnell,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fo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issu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⁴⁰ Linda Chao and Ramon H. Myers, *The First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⁴¹ 有關民粹威權主義在台灣之興起，請參看胡佛，《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87 年）；黃光國，《民粹亡台論》（台北：商周文化，民國 85 年）；魏鏞，《突破，邁向大格局的未來》（台北：商周文化，民國 84 年）。

陣營中津津樂道的台灣地區的民主化方面，也被指出李總統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決策過份專斷，導致民粹動員與威權決策共存的現象。此外還指控李前總統把金權及黑道，容納在國民黨及國會之內，因此反對李登輝人士對他被國民黨撤銷黨籍一點也不感意外。

但是無論人們如何評價李登輝總統，有一件事情可以確定：就是吾人必須要分析李登輝及類似李登輝人士的政治性格與台灣同胞數世紀來累積的情結兩項因素間的互動關係，才能了解近年來台灣政局及社會經濟的發展。

當我們深入分析台灣地區的現代化及政治發展過程時，我們就會發現台灣社會歷經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以及滿清政府等各種外來勢力的統治，在台灣人民心中的確有一種對外來勢力的抵拒心理存在。這種在殖民者統治下無法決定本身命運的「悲情」，的確代表著部份台灣精英的共同經驗，而一般民眾經歷不同階段的殖民統治，為了適應統治者所產生的焦慮感，正與精英的挫折感形成一種互動的架構；這種互動的結果，便產生了筆者所建構的概念：「心理治療性的政治(psychic therapeutic politics)」。

所謂「心理治療性的政治」，係用來於與「解決問題 (problem-solving) 的政治」加以區分的概念。在「治療性政治」中，領導者的政治運作的最重要的動機和考量，不在民主原則及政策效果，而在於掌握及操縱被領導群眾的情緒及情結，試圖把自己的價值觀和他認為的群眾的期望相結合，從而產生一種兼具民粹性與威權性的動員與決策運作，並經由這種運作，一方面鞏固權力，另一方面傳播特定價值觀。從這種過程中所產生的決策，可以在相當長時間內不求實際的具體效益，而只求滿足領導者及群眾內心的需求；這種政策便是筆者們所稱之為「宣示性政策」，以有別於解決問題的理性決策模式。(見圖八)

運用以上這種模式，我們可以針對台灣政治作相當程度的解釋，把台灣地區精英與人民的互動關係，與政治學中的比較政治文化，個人的政治性格與社會價值的適應過程，建立相互攻錯、相互徵引的關係。譬如「加入聯合國」、「元首外交」、「南向政策」、「達賴來訪」以及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等一系列看不出具體績效的政策，從「治療性政治」與「宣示性政策」的角度觀察，便可進一步了解其形式的原因和產生的作用。在此要舉出一點，這種形式的政治運作，也不限於台灣，為金融風暴所困的東南亞政治領袖，為柳文斯基事件所困的美國柯林頓總統的作為，以及德法日等國右翼政治的興起，多少均可以看到這類政治運作的影子。(見圖九)

但是民主國家的政策作為，究竟不能永久停留在心理治療的階段，而終究要負起責任，拿出真正辦法，能解決問題的方案，為國家增進安全、為民眾增進福祉。西方學術輿論批評政府施政作為，常問道「牛肉在哪裏？」事實上，面對經濟上衰退、失業率上升、兩岸關係的僵持、自然環境的惡化，台灣民眾已漸漸不約而同地發出「政策在哪裏」的呼聲。如果西方社會的「牛肉」可以比做華人社會的米飯，那「治療性政治」也許可以比做檳榔。檳榔可以刺激我們和麻醉我們，但長期只吃檳榔是不能養生活命的。要健身，還是非得靠米飯——一切實可行並

能在一定期間內獲得具體結果的政策——不可。所以筆者的結論與建議是：走出歷史的悲情，邁向平衡冷靜的思考；脫出「治療性政治」的陷溺，提升到理性開放性社會的運作。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拋棄只能滿足情結的宣示性政策，創造真正能夠增進國家社會及人民福祉的問題解決策略。

七、從理性化建設到非理性化操控—— 台灣經驗對世界的啟發與含意

本文從現代化觀念的澄清出發到台灣地區發展過程分析模式的建造，試圖為現代化及國家建設創造出解釋台灣經驗及互動性的理論典範（Paradigm）。全文的前段提出了現代化過程的分配性模式，同時也對台灣地區的發展做了一個歷史性及制度性的剖析。但筆者在本文最後一部份卻提出了另一個新模式——就是心理治療的政治與民粹威權主義的互動模式——來解析以至預測李登輝總統執政後的台灣政治發展情勢。

論者或以為筆者針對同一現象卻提出兩種不同的解析模式，不免有陷入自相矛盾之嫌，其實不然。原因之一是本文作者為Robert Merton 的中程理輪（Theory of the Middle Range）的服膺者⁴²。筆者認為吾人對一大型的社會現象不一定要刻意一開始就作全般性的解析模式，而可試圖用較低抽象層次的模式作部份性的解釋。其二是台灣發展過程有階段性。不同階段自然可以用不同模式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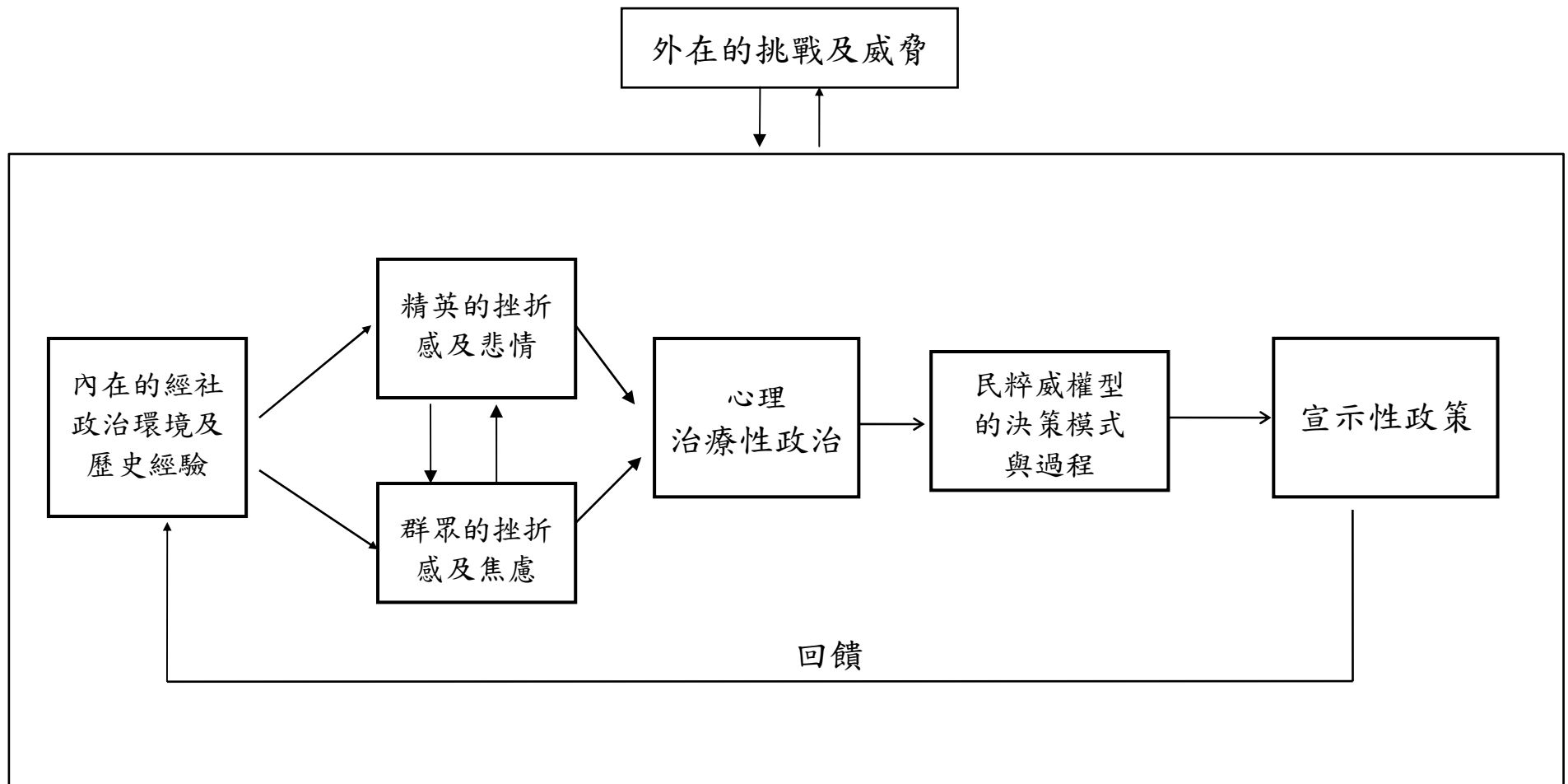
上述針對台灣發展的理論模式，實際上對世界其他地區也有啟發性。從許多國家，包括已開發國家在內的狀況，我們均可以看到在一國現代化過程中，不同的政治精英在不同的階段運用不同的手段來治理國家及爭取人民支持。制度性的規劃及理性決策模式與心理治療性的民粹威權統治是交替出現甚至同時並存的現象。冷靜的整合性的政策作為與激情的文化的政治訴求，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也常同時並存。歐洲及日本極右政治勢力的抬頭及中東和中南美洲民粹式領導人物的持續獲得掌權的機會，再度證明了心理治療模式的潛在有用性和有效性。

—全文完—

⁴² 見 Robert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The Free Press of Gencoe, 1957), pp. 5-6.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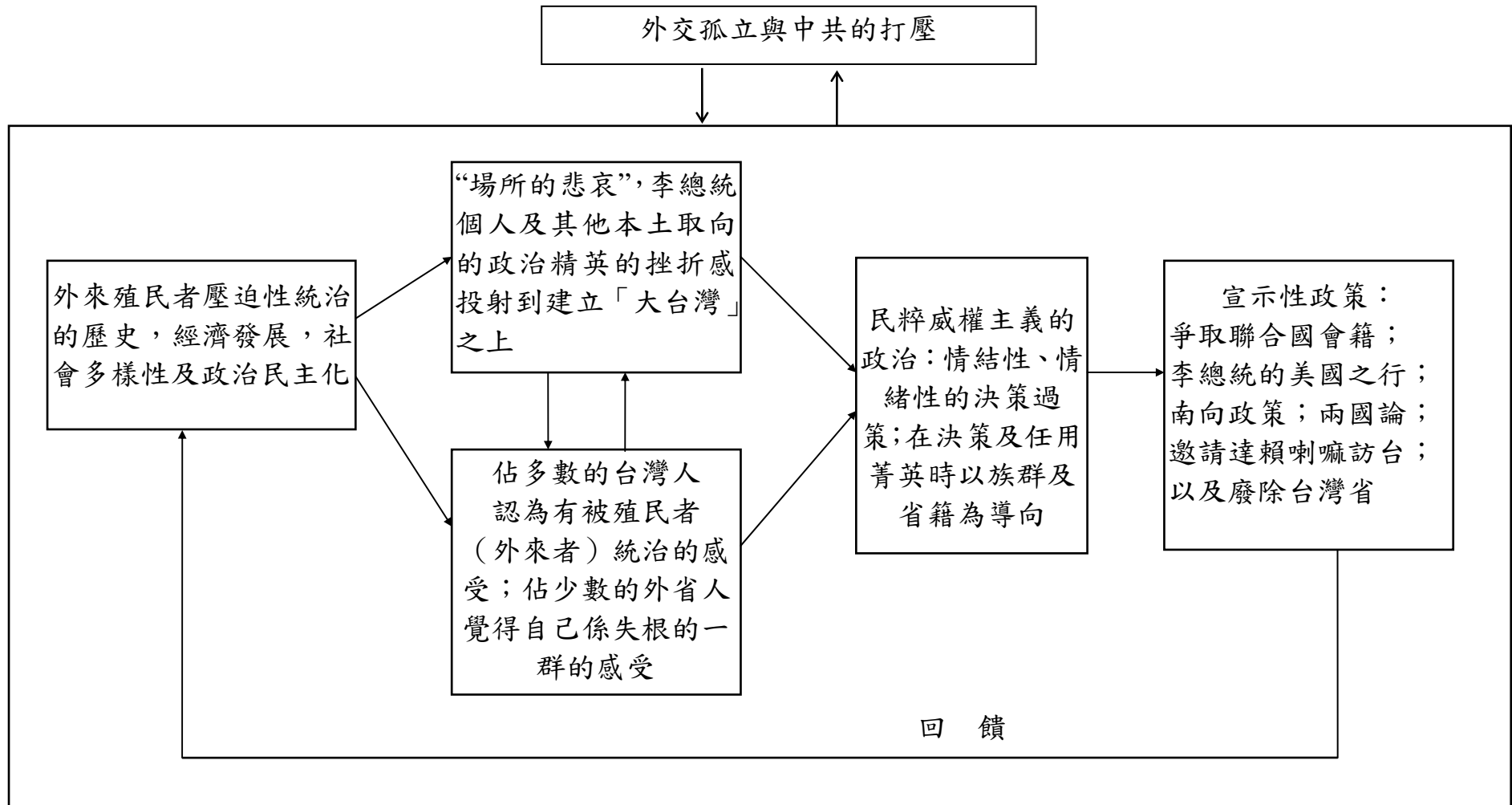
治療性政治與民粹威權主義：一個啟發性的模型



魏鏞製圖，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六日。

圖九

心理 - 文化分析與民粹威權政治：台灣之例證



魏鏞製圖，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六日。